



AI 制图

在来宾，听见叶落的声音

韦慧兰

周末的来宾，阳光慢悠悠地溜进客厅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最爱歪斜在沙发上，漫无目的地翻几页书，或刷一会儿视频。那天上午，我偶然点开手机笔记，发现里面躺着许多细碎的时光：有看夕阳时的心情，有老领导突然来电点评文章的感动，有回到老家的开心片段，甚至还有一段——记录几片叶子掉落的声音。

那也是一个寻常的周末，寂静的办公室里只我一人。窗外天光云影悄然流转，而我指尖敲打着键盘，目光紧盯着屏幕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耳畔忽然飘来一声极轻的“窸窣”。那声音细若游丝，在寂静中却格外清晰。我不得不停下敲字的手，缓缓抬起头。

目光越过屏幕边缘，只见几片小树叶静静躺在地上。深绿的叶面仍泛着光泽，叶缘微微卷曲，仿佛从那株盆栽上轻轻跃下，特意来赴这场午后的约。我怔怔望着，忽然明白：方才那一声“窸窣”，原是叶落的声音。

这几片小叶子深深打动了。虽然我叫不出这棵小树的名称，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它日日守候在这里，我们是朝夕相处的朋友，呼吸早已融入彼此。那声响，应是它们在向我告别吧。

我立即停下手头的活，在手机笔记里认真记录：

周末
埋头案首
忽闻窸窣
缓缓抬头
几叶静卧
天呀
我真真切切听见了
叶落的声音
那么具体
那么新鲜
更是一种感动
更是一场浪漫的告别
(2023-5-27 16:50)

一直以来，我总以为落叶是无声的，是生命归于沉寂的隐喻。却从未想过，它竟会以如此具体的声响宣告退场。这声音里没有悲戚，反倒带着从容的笃定，像是完成了一季的使命，便坦然与枝头作别。

而人呢？我们总在步履匆匆中追逐“结果”——为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操心，为父母的健康担忧，为未完成的工作焦灼，为未抵达的目标奔波。

那声叶落，仿佛一记温柔的提醒：人啊，有时可以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松弛一点，再松弛一点，才能看见生命本来的模样。

我不禁羡慕起这几片小叶子：它们认真生长，从容告别。它们更是幸运的，纵然只是一声轻响，也能在某个寻常午后，被一个人记录，被一颗心稳稳接住，安放成久久不散的温暖印记。

武宣烽火绝境下越挫越勇

——龙德洽与古龙、平龙村民革命壮歌

晓 晓

1947年12月的寒风裹挟着杀气，掠过武宣县桐岭、通挽的田埂——广西省保安副司令莫树杰奉命“进剿”中秋起义部队，攻占各起义村，悬赏捉拿龙德洽等领导人，用“杀”立威、以“骗”诱降，妄图阻断游击队群众根基、掐灭革命火种。

亲历者龙贵殿回忆，12月19日清晨，敌人突袭大团村，于甘家柴房抓出古朴村赖炳昆、克胜村陆永鳌，押至通挽当众杀害，鲜血染红黑土。随后在新龙、通挽等地强开“缴械投诚”大会，将群众如牲口般驱至会场，逼饮混着鸡血的米酒，立下“反政府就天诛地灭”毒誓。

血腥威慑与卑劣诱降未能掐灭火种，反而让一二一纵队政治部主任龙德洽决心向险而行。他曾想带队伍去十万大山避险，却因局势变化让队员撤回隐蔽。他在上级“原起义区需要人回去工作”的布置下毫不犹豫地回来了——桐岭、通挽的桥关口有哨兵盘查，圩街客栈贴满悬赏照，每一步都如踩刀尖。但他心里透亮：“族亲、村民、队员都在这里，我得把散了的心拧成绳。”

潜回后，他昼藏岩洞，夜访各村，给群众打气：“敌人越狠越怕我们，怕我们团结、不低头。只要不散，天总会亮。”龙德洽的“勇”并非蛮干，而是明知险仍向前的坚定决策。他的话成了村民的“定心丸”，老人们后来常说：“他和我们住岩洞、吃野菜，连幼子都送进队伍，这样的人，我们信得过。”

龙德洽的坚守凝聚了亲属：大哥龙德明是当地名中医，成为游击队幕后保障，随时随到医治伤员，更送二子龙振杰、龙亲入伍；二哥之子龙震廷，时读柳州高中，看到武宣中秋起义报道后，连夜返回桐岭：“四叔，读书救不了眼前民众，我要跟你干革命。”三哥龙德本奔乡村医生安插加入政工队，1948年担任中共桐岭区工委书记，险重任务前从不言累和怕；堂叔龙世彬在桐岭区公所当伙夫，暗

中做内应，第一次解放桐岭时趁夜开门助游击队攻进区公所，后长期任武工队联络员、情报员。

亲属热血投身，坚定了族亲抗争决心。一二一纵队分队长龙德仕，第一次解放桐岭时率队冲锋，被敌弹穿腰致腰椎受损（解放后定为二等乙级残疾军人），伤愈后仍坚定归队，后历任桂中南区十九团武宣独立营排长、新二十四团连长、武宣县公安队队长。一二一纵队副中队长龙德霄，起义受挫后转战贵武来边界，1948年5月回村发动群众被捕，关押桂林监狱仍宁死不屈，直至解放。

亲属带动下，点燃了古龙、平龙两村的革命火种，两村族亲纷纷挺身而出。1947年中秋起义初，古龙村龚喜悦、龚腾（龚喜塑）、龙振瑾（龙光）、龙振学（龙森）、龙礼威、龙兴荣等，平龙村龙贵殿、龙贵兴、龙贵灵、龚炳武、龙致仁等数十人，毅然加入起义部队或民兵。起义受挫后，他们仍坚定参加武工队，或做“堡垒户”，在白色恐怖中顽强斗争。

15岁的龙荣是队伍里最小的。1947年秋，他以全乡第十二名的成绩考入桐岭高小，两个月后，街头悬赏父亲龙德洽的布告撕碎了他校园生活——母亲连夜拽他离校：“荣啊，他们抓不到你爹，会抓你。”在张宽村避捕的大伯爷龙德明叮嘱他：“你得藏好，好好活着，才能接着干革命。”

局势稍缓后，龙荣随母回村却不敢去上学，怕被“黄衣兵”（村民对穿黄衣国民党兵统称）抓走。龙德洽未让儿子躲进温室，默许他加入游击队。起初游击队看他年纪尚小，背长枪还拖地，不愿接纳，听闻是龙德洽之子才心软：“带在身边总比让他在家安全。”此后，龙荣与堂哥龙华常摸黑去刷墙报，专挑墙角、树干写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”；有时藏情报于裤腰当交通员，或帮队员送饭，或蹲山林草丛站岗，听见狗叫声便吹口哨报信；白

天在田里干活也紧盯村口，见“黄衣兵”便抄小路飞速回村，帮助族亲转移。

长期夜宿山林，龙荣患上了疟疾，寒热交替险些丧命，幸得龙德洽多方寻来西药治愈。1948年底一天半夜，龙德洽召集堡垒户在村背山开会，龙荣放哨时，父亲特意走过来摸他的头：“荣啊，虽不能上学，但别荒废学习，解放后知识有用。万一我死了别难过，革命者生得伟大死得光荣。”这话龙荣记了一辈子：“是父亲带我进队伍，让我知再难的日子，只要有信仰就能跨过去。”那些年，龙家人与村民在流离中苦熬：男人们夜宿山林岩洞，饿了分食野菜与村民偷送来的干粮，饥一顿饱一顿却无人抱怨。

革命火种亦在妇女手中传递。龚玉娥、龙妈唤、龙妈安等30多名壮族妇女，既是亲属参军坚定支持者，更是游击队后勤兵：深夜缝补衣物、清晨肩扛粮袋，凭智慧勇气在封锁线间传送情报。

当游击队遭遇围剿，陷入弹尽粮绝时，龙荣族人及村民们豁出家底支持：龙德洽卖掉行李充作队员转移路费；有人卖田产、捐口粮，就连族老“公浮”（龙致睦）、“公瘦”（龙芝显）掌管祭祀祖先、救济族人的公共“蒸谷谷”（非天大的事由绝不动用），也在族人“该捐”声中，全数送到游击队手中。这份倾其所有的支持，成了后续武工队最坚实的后盾。

有人问：“不怕死吗？”他们回答：“怕。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，怕也会死，不怕反倒可能活。就算死了，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”在这群越挫越勇的革命者中，龙光、龙政款两位年轻子弟，用生命践行信仰，二人的名字永远镌刻在武宣县马鞍山公园革命烈士纪念馆上。

龙光（1928年生），1947年武宣中秋起义后任一二一纵队侦察班长，常乔装成货郎潜入敌营搜情报，为作战计划提供依据。调任警卫员后，以“人在领导在”的忠诚担当守护安全，被司令员韦敬

礼赞为革命队伍“安全阀”。为打破敌占区封锁，他又主动承担地下交通员，在敌方严密搜查下巧妙穿梭传递党的指示与情报，协助建立10余个地下交通站；起义受挫后，加入武工队持续斗争，带领战士在山区与敌人周旋，深入群众建立解放同盟会，协助发展会员达3000余人，多次粉碎敌人清剿计划，凭功绩成长为新二十四团排长。1949年武宣解放后，龙光主动请缨奔赴东乡、桂平剿匪一线。当地山高林密、匪徒负隅顽抗，他毫无惧色，带领战士摸排匪踪、制定方案，在多次交锋中身先士卒。1950年2月东乡剿匪战斗中，龙光不幸中弹壮烈牺牲，将短暂青春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。

龙政款（1924年生），1947年主动投身武宣中秋起义，凭高强度武艺完成突袭任务，曾以双手倒立姿势跨群众爬行彰显革命斗志。1950年新龙圩剿匪，匪徒潜逃后躲进民房负隅顽抗，部队多次进攻受阻。“我上！”龙政款不顾民房内土匪持枪威胁，匍匐至大门，欲踹门破门突入，近战制敌，就在抬脚瞬间，屋内土匪扣动了扳机。他应声倒下，虽未亲手擒获匪徒，却为后续战友攻克民房、擒匪创造了条件。这位年轻的烈士，用“冲锋到最后一刻”行动，诠释了革命战士的无畏本色。

如今，古龙、平龙村背山林，仿佛看见当年的松明火把——是龙德洽动员的光，龙荣放哨的星，村民抱团取暖的亮。武宣革命能从白色恐怖中突围，最终迎来解放，从不是某个人孤军奋战——是靠村民“全家跟党走”的决绝，是“自带干粮闹革命”的赤诚，更有龙光、龙政款这样的年轻人，用22岁、26岁的生命重量，把“越挫越勇”刻进武宣山河的骨血里。

这份绝境坚守，是指路明灯，更是红色“传家宝”，提醒着每一位武宣人：今日的安宁，是无数先辈用热血换来的；而“豁得出、顶得上”的革命精神，更应永放光芒。



AI 制图

探寻象州革命烈士名字背后的谜团：

两个名字，一座墓碑

陆永忠

上小学时，每到寒暑假或星期天，我们几个小孩总喜欢到罗秀镇往东一座名叫“保帅岭”的小山去玩。山顶矗立着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，碑下是一排烈士墓。再往东大约二十米，另有一座孤零零的坟，我们好奇地凑上前去辨认墓碑上的文字，中间写着“郑功成之墓”。我曾看过小人书《郑成功收复台湾》，“郑成功”与“郑成功”，虽字序不一样，却让我记住了“郑成功”这个名字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当地政府重修保帅岭上的英雄碑和烈士墓，把“郑功成”的坟迁来与原先的烈士一起安放，但墓碑上的名字却变成了“郑功臣”。我疑惑，不是叫“郑功成”吗？怎么变成“郑功臣”了呢？难道这是另外一个人？直到数年后，我意外从一本书上看到郑功成烈士的事迹，再次勾起那段记忆。郑功成与郑功臣，会不会是同一个人？带着疑问，我查了很多资料，发现写的都是郑功成。后来，我专门跑去郑功臣的墓碑，发现墓碑上的介绍和资料上的记载完全一样。这样一来，说明郑功成和郑功臣是同一人。可为什么名字会不一样？

我的疑问还不止这些。对于郑功臣，我搜集到的资料介绍得简略。郑功成遇害时36岁，他没有妻儿吗？如果有，是否还住在村里或迁到其他地方？此外，郑功成是象州县寺村镇白石村人，遇害时在柳州，可他的坟墓为什么却在看似毫不相干的罗秀镇？

带着疑问，我先后询问不少寺村镇白石村人和罗秀镇人，遗憾的是多数人都不知情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个人告诉我，每到清明节，总有两兄弟去烈士陵园祭拜，他们住在罗秀老街，哥哥叫郑彬、弟弟叫郑桐。“你去问问，可能与郑功臣有关。”他说。

今年11月13日中午，我来到罗秀镇东街84号，正巧遇见在家吃中午饭的郑桐，郑彬在外未归，我便与郑桐聊了起来，其间他还找出爷爷郑功成的烈士证书。

1893年，郑功成出生于象州县

寺村乡白石村一个清末秀才家庭，1925年毕业于桂林师范学校，曾在家乡崇山村设馆教学。1926年冬，郑功成与同乡李忠惠等，到国民党柳庆区党务整理处党员特别训练班学习，结业后参加柳州区办农民讲习班，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后回到象州，担任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委员，并组建白石乡农会，成为推动当地农民运动的核心力量。他积极培养进步青年和妇女骨干，带领群众开展“二五减租”斗争，迫使地主接受减租政策，同时组织妇女协会剪发易服、上街宣传，推动男女平权思想传播。1927年6月，郑功成与刘策奇、覃智增等人组织3000余名农会会员和革命青年社成员齐聚县城，驱逐县长李镜堂，公开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。然而，国民党当局疯狂反扑，于1929年10月将郑功成抓捕，押解至柳州审讯，游街示众后于北教场斩首。赴刑途中，郑功成面无愧色，英勇就义时年仅36岁。

郑功成遇害后，其遗孀潘琼与仅7岁的儿子郑之裔，在村里屡遭地主、恶霸报复欺凌。不得已，潘氏将三间瓦屋贱卖，带着儿子来到罗秀老街，在把把巷租屋，以卖把把维持生计，此后未再嫁。艰难境况下，潘琼还收留了白石村一名孤儿郑世。日子安定后，潘氏请人将丈夫遗骨迁到罗秀，安葬于北门外放哨岭，后移至保帅岭。

郑之裔30多岁时加入罗秀桂剧班成为骨干，后娶大山岔村女为妻，生儿子郑彬、郑桐，另有一名小女儿。郑家之前一直保存着郑功成遗像及烈士证书，贴于屋内墙上，后建新居时遗失，仅剩郑桐用手机拍下复印的一张烈士证书，为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。

至于烈士证书和烈士墓碑上为何写“郑功臣”？原来，郑功成原名郑功臣，“郑功臣”之名是在组建农民协会时自己所改，以示革命一定会成功。“郑功臣”，是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人员秉持尊重历史的态度，故将其恢复为原名。至此，我的所有谜团全部解开。



重新回到来宾市兴宾区三五镇初级中学的校园，已是三十三年后。那里的主人——镇中的孩子们，笑问满头白发的我：“客从何处来？”

我笑言：“我也曾是这里的主人，是这里拼搏的一代。”

当年，校园没有围墙。实际上，我们也不需要围墙——对前途的渴望，早已在心中筑起一道自律的围墙。大多数同学都是农家子弟，读书是跃出农门唯一的出路。

每当晚饭后，校园后山与周边小路上，处处可闻朗朗书声。晚自习铃声一响，同学们便自觉回到教室投入学习。围墙于我们而言，成了多余的摆设。

当年的学习条件极为艰苦，学校时常缺水。遇上大旱，我们便要骑着笨重的自行车，到五公里外去运水。十二三岁的少年，驮着二十五公斤的水桶，在坑洼的土路上艰难骑行。上坡时拼尽全力，下坡时紧握手把生怕倾覆。待抵达学校，汗水早已浸透衣衫——这桶珍贵的水，要供两个宿舍的同学做饭、洗漱。

因为缺水，打球后我们只能满身汗味地上晚自习，放学后再摸黑到镇上找水擦洗。可奇怪的是，艰苦从未冲淡学习热情，反而淬炼出我们面对困难时不屈的韧性。

因为穷，家里五个兄弟姐妹中，只有

从三五中学走到央媒

蒋雪林

我这个“满子”幸运地获得了走进中学的机会。穷，成了我自自觉读书的动力。但那时的我，语文成绩一直不及格，作文常被当作反面教材。转机发生在初三那年：堂哥荣获广西作文竞赛特等奖的消息，像一粒火种，点燃了我写作的渴望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疯狂阅读，每周坚持练笔。

没人会想到，那个曾经对纸枯坐、笔如千斤的我，日后竟会以文字为业。现在想来，是母校那方水土的无形滋养，是同学们在逆境中埋头苦读的身影，是整个校园在缺水少物环境下依然蒸腾的那股不服输的倔强，让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无声雨露，沁入心田。

由于勤奋练习，原本一写作文就发怵的我，渐渐找到了感觉。我坚持每天写日记，记录所思所感。更庆幸的是，我遇到了好老师，他是我的初三语文老师黎俊辉。当我鼓起勇气将习作交给他时，他没有因我是“差生”而敷衍，反而暖心鼓励我多写多练。

次日晚自习，他把我叫到教室外，微笑着说：“你的作文感情真挚，非常动人。在黎老师悉心指点下，我笨拙的笔触渐渐找到了方向。期中考试，我的作文破天荒地成为范文，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。”从“反面教材”到范文的转变，如同同一道阳光照进心底，被认可的喜悦驱

散了我长久以来的自卑。黎老师的鼓励如同一粒火种，点燃了我心底的文学梦。自那以后，我便踏上近乎痴狂的练习之路，立志纵使成不了作家，也要成为笔耕不辍的“写家”。

初中毕业前夕，在黎老师指导下，我的诗歌终于变成铅字，发表在当时柳州地区教育局主办的《柳蕾》报刊上。握着承载三块钱稿费单据，喜悦重若千钧。那首小诗虽未在生活中激起多少涟漪，却在在我内心世界里下了一场润泽的春雨——“自信”的新绿破土而出。

怀揣着这点微光，我考上一所中专学校，学习化学专业，但笔耕从未停下。然而，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。中专毕业不到三个月，便赶上1996年的下岗潮。失业后的我不敢回家——父母为让我读书已倾尽所有，本该光宗耀祖的我却让他们失望了。

下岗三年间，我学过电焊，干过装卸，开过小店，尝尽世态炎凉。每当快要放弃时，总会想起那个在坑洼土路上驮水前行的少年。虽然当年能把二十五公斤的水驮过十里崎岖路，如今为什么不能把眼前的苦难扛过去？

转机再次眷顾坚持的人。凭借学校里练就的写作特长，我这个学化学的中专生，鼓起勇气叩响了一家报社的大门。面对招聘人员的拒绝，我直接致电报社社长：“请让我试一个月，这个月里，我不要你一分钱工资。行，我留下，不行，我自己走人。”

这位社长就是新闻路上的恩师邢浩峰，当时兼任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社长。多年后他告诉我，当时的新闻写作能力也就初中水平，但正是那句不留

后路的誓言，让他决心留下我。

坚韧，不仅陪我渡过了一道人生坎坎坷，更为我敲开了职场新大门。从初三时黎老师那句温暖的鼓励开始，在文学这条路上，我拼搏了三十多年，作家和诗人的梦想并没有实现。让老师略感欣慰的，是我做了一名记者，后来还成了一家中央新闻单位驻桂机构的采编负责人，尽管没多大成就，但无愧于我的老师。

回顾半百人生，如果说有哪些值得让老师骄傲的，那便是后来我作为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组员，赴安徽、黑龙江等省开展督导工作，获得了荣誉称号“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工作者”。

年过半百，作家梦如天渐渐远的帆影。然而，当年在三五中学那片精神沃土里埋下的“坚韧”种子，早已长成我手中一支力求真实记录时代的笔。我曾连续十三年，在每年的小年夜，去报道、去“陪伴”广西的“摩托车返乡大军”。即便父亲病重住院的那些艰难时日，我在医院的走廊里稍得喘息，心中放不下的，仍是那条漫漫归途上的悲歌。我想用文字安放这些平凡者的艰辛与期盼。这样的坚持于我而言，不过是换了种方式，继续在那条驮水的土路上前行。每当稍有懈怠，我总会忆起少年时：我们骑着笨重单车，在坑洼土路上颠簸往返，只为从五里外驮回一瓶维系希望的清水。



扫码聆听更多美文。